

郑成功抗清的发展过程及其动摇妥协倾向

陈碧笙

对于郑成功抗清的认识和评价,有过两种倾向:一种是极力颂扬郑成功的忠君报国思想及其在抗清中的表现,认为郑成功生平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抗清,象收复台湾这样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行动也不外是抗清的继续。这是两百年来的传统倾向,多多少少中了一些封建思想意识的余毒。另一种倾向是强调郑成功抗清的人民性和正义性,说他如何如何得到了沿海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又如何如何争取与农民起义军团结合作等等,把郑成功大大现代化了。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对于郑成功抗清的历史事实缺乏正确了解,对于许多重要历史资料没有运用阶级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仅仅根据主观想象或一些不可靠的记载作出结论。恩格斯说:“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斗争(不论它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领域中发生的,或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实际上只是各个社会阶级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的表现。”^①本文试图从郑成功代表海上商业资本利益这一基本史实出发,比较系统、全面地分析其在抗清中对于海上武装集团、明清统治阶级以及沿海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关系,进而对郑成功抗清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提出若干初步的看法,错误与不当之处,希望史学界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 郑成功抗清的发展过程及特点

从其发展变化过程看,郑成功的抗清活动大约经历了如下三个时期:

第一期:从隆武二年(1644年)海上起兵到永历五年(1651年)建立金厦根据地。

郑成功初起时,从者仅三教百人,“船械两缺,部旅单弱”,在当时海上反清武装中是比较弱小的一支。最初两年,曾出兵攻打泉州、海澄、同安,在强大清军阻击下,一再败却。永历三年(1649年)以后,转至粤东揭阳一带活动,先后攻破潮州外围南洋、达濠、霞美等十数砦寨和潮阳、揭阳、惠来三县城,招降张礼、柯广、朱尧、唐玉、黄亮采、黄海如诸部,进围潮州。永历四年(1650年)八月,回师厦门,以计杀其族兄郑联,并其军,又招徕郑彩涂部,兵力扩充至四万余人。永历五年(1651年)四月,追究厦门失守和放走马得功的责任,斩堂叔芝莞以示众,迫胞叔鸿逵交出所有水师,同时吸收浙海海上武装张名振、周崔芝、阮骏、黄大振诸部,兵力扩充至六万余人,声势始大。经过前后五年对内对外的种种尖锐斗争,成功凭借其坚强的战斗意志和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以次剪平闽南粤东沿海诸豪强武装,初步完成了郑芝龙旧部的统一。郑彩对洪政说:“细观诸子弟,能继志者大木(成功字)耳”;“鸿逵在金门,见成功举动威严,执法无私,亦将船只悉付之”^②;这样才取得了海上武装集团公认的抗清领袖的地位,奠定了进一步扩大抗清活动的基础,是为大规模抗清的准备时期。

第二期：从永历五年建立根据地到永历十一年（1657年）决策北上江南。

永历五年三月，成功率师南下粤海，厦门被清军乘虚攻破，库藏尽失，军心动摇，不得已班师回救。经过这一次教训之后，成功深感倾师远出之非计，乃改取以金厦为根据、恢复漳泉为基业的稳扎稳打的战略方针，先后出兵攻打漳泉诸属邑，与清军大小十数战。永历六年（1652年）三月江东桥之役，大败清浙闽总督陈锦之师，陈锦为家丁所杀。同年四月至十月围困漳州之役，城内军民饿死过半，至食人肉。永历七年（1653年）五月海澄之役，击退固山金砺所率满汉精锐数万。永历八年（1654年）二月，顺治下令招抚，成功一面与清吏和谈，一面仍分兵四出。同年十一月，先后收复漳州府城及南靖、漳浦、同安、南安、惠安、仙游诸县城，基本占领了闽南沿海地区。在同满洲精锐长期战斗中，郑军愈战愈强，军事进展很大，兵力扩展至二三十万人。“海外诸国惟日本最富强，闻郑氏兵精，颇惮之。”^④政治上则奉永历正朔，尊重明室元老遗臣，改中左所为思明州，设六官，建制度，通贩日本、南洋诸国，以恢复中兴相号召，金厦地区成为东南抗清的中心，这是抗清斗争迅速发展时期。

第三期：从永历十一年决策北上江南到永历十五年（1661年）收复台湾。

永历十一年以后，成功看到西南抗清形势每况愈下，一旦清军“会天下之兵以攻我”，两岛很难独全，因决策大举北上，以求扭转抗清战争的颓势，这是战略方针上一个重大的改变。北征准备自永历十一年起积极进行，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亲率水陆精锐十万余众，配船二百余号北上，军容整齐，声势浩大，是成功起兵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永历十三年（1659年）五月，进入长江。六月十六日，在瓜州大败清军，破滚江龙，俘朱衣佐。廿三日，歼灭管效忠部满洲精骑数千人，进克镇江。七月初，围南京，大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闻风纳款，东南大震。但成功为胜利冲昏头脑，骄兵轻敌，疏不为备。清军于廿三日乘虚出击，郑军大败，精锐损失近半，大将甘辉、万礼、张英皆阵歿。成功退至镇江，休息三日，看到抗清前途无望，决定全师南返，另作别图，这是战略方针上又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八月，军次崇明，派蔡政赴京向清廷求和，遭到拒绝。永历十四年（1660年）五月，在厦门击退达素率领的三省覆岛大军后，即集中全力于收复台湾，以迄于死。这一时期的抗清战争，以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为特征，可以称为抗清的决战时期。

如上所述，在前后十四年的抗清活动中，最初五年主要致力于自身力量的扩大和充实，与清军很少接触，用成功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南下数年，已作方外之人。”^⑤最后一年（永历十四年），主观打算上已决定退出抗清，不过一时还不可能立即退出。而抗清斗争进行得最活跃、最有进展的，不出永历五年六月至十三年七月的最后七年间，其中又可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永历十一年以前，以固守观变为主，闽南粤东沿海是活动的中心；永历十一年以后，采取决战姿态，以大江南北为进取的对象。这两个阶段的抗清活动，又大部分是在边战边和，和战并用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成功一生的抗清活动，始终是以保全、壮大自己为决策的中心。随着抗清斗争的进展，郑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也就迅速得到增长和扩大。从最初的三数百人扩充到北征前夕的二三十万人，从海上孤旅一跃而成为东南抗清的一面旗帜。成功坚持、推动抗清斗争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自身军事政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这是我们应该注

意的又一个特点。搞清楚这些基本史实，将有助于进一步探讨郑成功抗清斗争的各个方面的问题。

（二）海上武装集团在抗清中的动摇、妥协倾向

郑成功在坚持、发展抗清活动的过程中，一刻也离不开海上武装集团的拥护和支持，然而海上武装集团对抗清却又具有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这是一个重大的矛盾。

在海上武装集团中，郑芝龙是最早有意识地对封建专制政权寻求妥协的一个人。当其以“海盗”面目横行海上之时，即曾“两次大胜洪都司（先春）而不追，获卢游击（毓英）而不杀”，百计求抚，以是得厕身于明季权贵豪门之列。清军入闽，芝龙本其过去投靠明廷的经验，不听子弟劝谏，^①既首进降表于前，又亲往见贝勒于后，结果还是被挟北上，田川氏继复受辱而死，不仅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自由，连田园、第宅、子女、玉帛也不能自保。清军又进一步加强军事进剿，严禁人民下海通番，企图彻底消灭这一批化外的海上武装。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不仅血性男儿如郑成功要带头反抗，海上武装集团中任何一个人，从郑门骨肉鸿逵、郑彩、郑联以至芝龙旧部陈豹、林察、周瑞这些人，只要力所能及，也无不蜂起反抗。在这一时期，海上武装集团对于抗清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是坚决的。

经过几年的实际较量之后，清廷逐渐发现这一批海上武装是颇不容易对付的。倚海为长城，出没波涛，满洲铁骑无所施其技，此其一。沿海人民交通接济，神出鬼没，禁不胜禁，防不胜防，此其二。与李定国、孙可望诸军遥相呼应，隐为东南肘腋之患，此其三。因此乃改取以抚为主，剿抚兼施的方针，先对郑成功本人百计诱降，除允许其保持海上通商利益外，还以海澄公爵和漳、泉、潮、惠四府地盘相饵。此计不售之后，又转而向郑军将领开展分化、收买活动，他们说：“悬此印（按，指海澄公印）于国门，彼中岂无有内应者！”^②在清朝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海上武装集团抗清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妥协投降的倾向逐渐抬头。加上郑军内部加强控制与反对控制之间、文官与武将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不和，郑军将领率众降清的事件就层出不穷，影响到抗清战争的顺利开展。根据各书记载，成功回师厦门以来郑军内部因投降或通敌而发生的异动事件，比较重大的有：（1）永历四年十二月后劲镇陈斌降清；（2）同年同月黄海如通清；（3）永历五年五月左先锋镇施郎出走；（4）永历八年四月援剿前镇黄大振因通清嫌疑被杀；（5）永历十年六月前冲镇黄梧献海澄降清；（6）永历十一年十一月英兵镇唐邦杰率前鋒、亲随二营降清；（7）永历十一年六月，左冲镇洪善阴通施郎；（8）永历十二年九月北征途中，北籍将领因通清嫌疑全数撤职；（9）同年十月后冲镇刘进忠率众降清；（10）永历十四年五月右武卫陈鹏通清；（11）永历十五年六月右冲镇蔡禄、宣毅左镇郭义据铜山降清；（12）永历十六年三月镇守南澳、忠勇侯陈豹降清等十二次。永历十六年（1662年）成功病歿，郑氏骨肉相残，军心离散，降将更如过江之鲫。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云：

“时成功新亡，复有袭、泰之役，郑氏将佐多生心。江、浙、闽、广四省，复有满汉兵部郎中各一人专司招抚，无论真贋，降四级叙实官，或以武资换文秩，人心浮动。于是郑广及忠勤伯（按，当为忠靖伯）陈辉、庆都伯王秀

奇、武卫杨富、虎卫何义、都督阮美、郑殷、陈舜穆自台湾，林顺自镇海，周家政自温州，将士军民数万先后降。其别部入梁山者亦为降将析光秋所败。经势衰乱、……

“总兵翁球多以其军民降。薰廷、周全斌忽不协，遂及周亮、杨洋、周珍、曾付、黄宝、林英、张隆、阮星、欧瑞、陈麟、赖工、张岳及兵民三万六千有奇先后降。南山、镇海、佛潭桥诸屿皆没。台湾属地几尽。”

在清郑双方军事政治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过程中，清将降郑的固然为数也不在少，但绝大多数都是中下级将吏，象成功所破格擢升为右提督的马信原是清台州府守将，左提督郝文兴原是海澄县守将，后期抗清名将刘国轩原是漳州城门千总，其余都是府县城守将或副将，总兵以上一个也没有。反之，郑将通敌降清的，如刘进忠、蔡禄、郭义、陈鹏、杨富、何义等都是手握重兵的镇将，黄廷是前提督，周全斌是承天府南北两路总督，王秀奇是总制五军戎政，封庆都伯（一作祥符伯），陈辉是水师统帅，芝龙时代老将，封忠靖伯，陈豹也是老将，长期镇守南澳，地位在五提督之上，封忠勇侯，他如施郎（后改名施琅）、黄梧、唐邦杰等都是成功一手提拔的亲信，郑鸣骏、郑缙绪更是郑氏一门骨肉，镇守后方重镇金门，家资巨万，精兵八千，是海上有数的豪门。大多数清将都是在优势郑军的长期围困下势穷被迫出降的，所带去的队伍也不多。而郑将则多是乘形势比较缓和、防务稍疏之际，或则主动献城，或则带去大批人马、辎重、武器而降清。如黄梧降清时就曾“带领官八十余名，兵一千七百余名，并红衣砲三百余位，……粮粟二十五万，军器衣甲銃器不计”，蔡禄、郭义降清时带去右冲、宣毅左右两镇兵丁四千名，郑鸣骏、郑缙绪带去精兵七千三百多名，陈辉、黄廷、周全斌等前后两批带去的一则“数万”，一则“三万六千有奇”。象这样大规模集体出降的现象，在当时其他抗清武装中是很罕见的。过去有人以之归咎于郑成功的“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如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滥用权威，人多思叛”（如朱希祖《明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显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应该说，这是海上商业资本及其武装集团抗清不彻底性、动摇性的一个很自然的表现。

海上武装集团的抗清动摇性还表现在大多数将领重视金厦，反对倾师出击，反对与清军决战这些行动上。关于这一类性质的斗争进行得较为隐蔽一些，见诸记载的也不多，但却代表着郑军内部思想情绪的主流，对成功坚持抗清的大计和方针是有重大影响的。下面试就三个较重要的军事行动略加分析：

（1）永历四年（1650年）一五年（1651年）间第一次南下“勤王”之役。

永历四年十一月，成功奉永历召，率师南下“勤王”。十二月二十日，大军行至广东揭阳，“时父老（留）辙劝驾”^①。五年正月初四日至南澳，“镇守南澳地方忠勇侯陈豹请见，告曰：……闻二酋已破广州，杜永和入琼南矣，此去或恐不遇，而中左根本，亦难捨也。不如将此南澳地方听藩主驻节，居中调度，豹愿前驱，督同各镇南下，诣会王师，候有信，请藩亲行，未晚也”^②。接着，“左先锋施郎入告曰，‘勤王臣子职分，但郎昨夜一梦，似大不利，乞藩主思之。’藩如来意，心含（啣），许之，遂令将左先锋印并兵将令副将苏茂管辖”^③。

揭阳父老的留辙，西澳陈豹的劝阻，看来都不是孤立的行动，阻师不成之后，施郎

乃以辞去左先锋一职相要挟，成功不为所动，即卸去施郎兵权，这就是施郑反目的起因。

三月二十二日，大军开至大星所，清军袭陷厦门报至，“时三军闻之，哭声遍野，诸镇亦来劝驾回棹（棹），谓三军各怀家属，脱巾亦是可虞^①。”面临着全军瓦解的形势，成功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师，第一次出师“勤王”之役就此宣告结束。

（2）永历八年（1654年）第二次南下“勤王”之役。

永历八年十月，成功接李定国约期会师之信，派左军辅明侯林察、右军闽安侯周瑞等统率“官兵数万，战船百只，……发行粮米十个月”，“尅日南征”。这是一次规模不小的军事行动。时值北风初发，顺流疾驶，十余日可抵粤海。定国师于十月十四日围新会两个月，十二月十四日始因清军援至解围。郑军如能剑及履及，兼程以赴，双方会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无如林察等虚应故事，在海上逗留观望到翌年五月，全军不发一矢折返厦门，失去了与西师会师、挽回战局的良机。《实录》第68页云：

“五月，藩驾驻思明州。总督辅明侯林察并周瑞等入粤勤王班师回到思明。时西宁王师望我师不至，被虏战败，退入梧州，我师不遇而回。藩集文武官吊林察等责之曰：‘勤王入援，君命原无候驾，逗留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于是众俱以闽安侯对，藩令正罪，以徇军中，诸将劝免。”

事后虽欲正罪示儆，也碍于诸将情绪而未能果行。成功在其后致李定国书中也承认说：“诿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先已班回数日……但敝船逗留，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效，使丑虏长驱，实与有罪焉”。第二次出师“勤王”之役又以毫无结果而告终。

（3）永历十一年（1657年）一十三年（1659年）北上江南之役。

在永历十一年决策北上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文官如潘庚钟、冯澄世、陈永华等皆主张倾师北上，与清军一决胜负，得到了郑成功的赞同，惟武将领袖甘辉“坚执以为不可，恐邯郸学步，反失其旧”；“倘大队前进，而贝勒侦知，会合水师，出攻两岛，岂不危乎？”^②到了永历十二年四月大军出发前夕，甘辉仍向成功进言：“以辉愚意，未可深入，不如俟李定国、孙可望二人会师信到，然后进兵”^③。同年八月，大军至羊山遇风，漂没将士数千，船只军器亦多损坏，“诸提督咸劝成功暂回厦门，功以业已出师，理无再还”^④。这种将士不愿远征的情绪，成功大概也不无所闻，所以有“传谕官兵搬眷随征”之举。^⑤北上江南，成功是下了最大的决心，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的。南京之战虽败，但“全军犹在，^⑥‘兵势尚强’，^⑦清军暂时亦尚无力大举反攻，所以不听张煌言、罗子木等人劝阻，毅然决然放弃瓜镇南下，顾虑到士气军心不愿再战^⑧，恐怕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前后十余年的抗清斗争中，郑军采取主动进攻、战略意义较大的军事行动仅有如上三次，结果都因为郑军内部的种种阻力而没有收到应有的战果。海上武装集团的活动舞台在海上，根本利益也一刻离不开海上。当他们为了抵御清军进犯、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战时，可以勇敢杀敌，并且充分发挥其所长。但如果要他们为了所谓“恢复中兴”而远离闽粤沿海，舍水就陆，与清军角逐、决胜于千里之外，那就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了。特别在抗清战争后期，海上商业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郑军高级将吏或多或少

都兼营一些洋船贸易，^②利之所在，谁亦不愿轻易放弃。郑成功虽然壮志满怀，屡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原”相号召，而面临着整个集团根本利益的矛盾，也是无能为力的。郑成功抗清不可能彻底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注：

- ①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德文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外文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4年版，页222。
- ② ③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六。
- ④ 郁永河《伪郑逸事》。
- ⑤ 杨英《从征实录》第25页，成功复其父芝龙语。又第34页载再复芝龙书云，“虽然，儿子己丑岁（1649）亦已扬帆入粤屯田数载矣。”
- ⑥ ⑩ ⑮ ⑰ 《台湾外纪》卷三，卷十。
- ⑦ 成功谏其父说：“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清朝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吾父若藉其崎岖，拒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外纪》卷五）鸿逵也说：“况兄尚带甲数十万，船舶塞海，粮饷充足，……何必委身于人？”（同上）这些话可以代表海上种装集团不愿降清的真实打算，要不要效忠明室是根本不在他们考虑之中的。
- ⑧ 夏琳《闽海纪要》。
- ⑨ 袭即成功胞弟郑袭，1661年随师入台，1662年阴历五月成功暴卒后，留台将领拥为护理，与郑经对抗。郑经在厦门闻讯，急率师渡海击平之。泰是成功谊兄，掌握郑军财政，拥资数百万，长期镇守金門，阴通郑袭之将黄昭，1663年被郑经用计诱杀，泰弟鸣骏，子缙绪率众降清。
- ⑪ ⑫ ⑬ ⑭ 《从征实录》第11页，第131页。
- ⑮ 《闽海纪略》。
- ⑯ 见《从征实录》第109页。徐孚远有《北伐命偏裨皆携室家行因歌之》、《再咏移家口》两诗专咏其事（《钓璜堂存稿》卷20）。
- ⑰ 《海上见闻录》载苏明对顺治奏对之语云：“海师不能持久，指日当有捷音。”苏明也是郑军降将，深悉海上虚实，所谓“不能持久”云云，大概也是指郑军将士不愿远离闽海说的。
- ⑱ 徐孚远《钓璜堂存稿》卷二《遣兴》诗云：“邻居何辉煌？朝夕列鼎食。问君何能尔？飞钱行海舶。舶多聚水工，纵横生羽翼。奏请披金紫，大者侯与伯。”卷三《入城》诗云：“偶来城市中，车马纷相见。东家印初悬，西家舶又至。高位与黄金，所求各已遂”。卷四《邻右》诗云：“邻右者谁子？寄身在军垒。自矜有资财，起宅荒山里。”卷五《贾客》诗云：“舶盛金多频奏请，君看贾客尽封侯。”卢若腾《岛噫集》《荒芜》诗云：“世乱多豪强，兼并恣狂图。膏腴连阡陌，犹欲争区区。”《拗歌》云：“去年争构连云宅，去年争买膏腴田。去年二八娉婷女，明珠争买不论钱。”《石丈》歌云：“为山为坞为亭台，豪家顾指给欣赏。胡为日费千夫力，长途攀运成尘块，金谷平原不让奢，役人岂惜千万强！”从这些避地海岛的明室遗臣的吟咏中，也可窥见当时海商资本发展以及郑军将士兼营海舶、亦官亦商情况之一斑。